

周易

ZHOUYI WENHUA YANJIU

文化研究

第三辑



主编
张涛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易

ZHOUYI WENHUA YANJIU

文化研究

第三辑



主编
张涛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易文化研究. 第3辑 / 张涛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5097-3082-9

I. ①周… II. ①张… III. ①周易—文集 IV. ①B221.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82661 号

周易文化研究 (第三辑)

主 编 / 张 涛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责任编辑 / 袁清湘 于占杰 范明礼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责任校对 / 曹晓伟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5.25

版 次 /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字 数 / 424 千字

印 次 /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3082-9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周易文化研究》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 余敦康

主 编 张 涛

副 主 编 邓瑞全 谢招修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岗	王 铁	王晓毅	邓骏捷	邓瑞全
任士英	刘长林	刘炳良	许钦彬	孙照海
杨效雷	吴长庚	汪学群	张 涛	范立舟
胡友鸣	胡汉生	袁江玉	贾贵荣	董晓宇
韩增禄	谢招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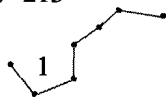
编辑部主任 邓瑞全 (兼)

执 行 编 辑 曹晓伟 孙世平 王晓梦 熊艺钧

主 办 北京师范大学易学文化研究中心
中国易学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
浙江名门经济文化研究院

目 录

焦循的经学与易学思想	陈祖武/ 1
两晋易学之嬗变	王天彤/ 5
陈抟与“太极图”关系浅述	章伟文 黄义华/ 13
程颐对张载易学的继承和完善	姜海军/ 27
《伊川易传》的心灵和谐之道	孙世平/ 48
以史证易与史事易学二三说	曾华东/ 58
王重阳易学思想初探	王冉冉/ 69
王阳明易学思想析论	任利伟/ 77
《周易》圆道与创新	刘长林/ 97
《谦卦》与谦之为德	余治平/ 113
《大象传》新诠释	刘鹿鸣/ 131
孔子易学思想形成的内在理路	
——以诠释学为视角	孙 航/ 152
帛书《衷》篇“《《》》之详说”章新释	刘 彬/ 168
《周易》与孔子的“神道设教”思想	孔德立/ 185
《孔子家语》与孔子易教思想	宋立林/ 193
《周易》与《骨相》《相列》	汝企和/ 204
五行与四元素宇宙论的构建原理及其比较	
——从葛瑞汉的“阴阳与关联思维的本质”谈起	王志轩/ 215



筮占与风水

- 以《易括地林》为中心 张齐明/ 224
- 略述八种少数民族的数占 王化平/ 235
- “左右尊卑”辨析（续） 韩增禄/ 249

- 《周易》与中国管理思想的起源 姚伟钧/ 285
- 关于易学与故宫学的几点思考 张涛 熊艺钧/ 292
- 对于易学养生思想的一点认识 曹晓伟/ 299
- 《卜筮正宗》序 邓瑞全/ 301
- 《梦溪笔谈》易说校正二则 谢 辉/ 303
- 探骊得珠 大道益彰

- 读张涛教授注评《周易》有感 张绪峰/ 308
-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日本版本易学善本叙录 李雄飞 李洁飞/ 311

附录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

- （卷七至卷十） 《周易文化研究》编委会 整理/ 320

焦循的经学与易学思想

陈祖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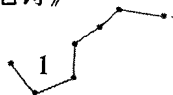
摘 要：清代《周易》研究，经过清初诸易学大师对宋儒易学的批判，至乾隆中叶，由惠栋、张惠言诸家“考明古义，表彰汉易”学术倾向的推动，引领经学界走向“唯汉是求”的道路。焦循作为扬州经学的集大成者，对“唯汉是求而不求其是”的倾向进行了纠正，并以“即学求是，贵在会通”的原则进行易学研究，终于摆落汉宋，自成一家。焦循的经学思想，是对乾嘉汉学的一个批判性总结，标志着汉学鼎盛局面的结束，以会通汉宋去开创新学风成为历史的必然。

关键词：焦循 经学 易学 汉易 宋易

清代的扬州经学，开风气于康熙、雍正间。泰州陈厚耀，穷究天文历算，接武宣城梅文鼎；宝应王懋竑，精研朱熹学术，撰写《朱子年谱》并《考异》十卷，以经学醇儒为天下重。乾隆六十年间，高邮王念孙、贾稻孙、李惇首倡于前，宝应刘台拱、江都汪中，兴化任大椿、顾九苞相继而起，后先辉映，蔚成大观。至焦循出，终以通儒而结成硕果。

焦循，字理堂，一字里堂，晚号里堂老人，扬州府属甘泉人。生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卒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终年 58 岁。他早年为诸生，攻举子业，习诗古文。科场角逐，叠经颠蹶，至嘉庆六年（1801）举乡试，时已 39 岁。翌年入都会试，再遭落第。不堪举业蹉跎，自此绝意仕进，托疾不出，蛰居于所葺雕菰楼中，以著述授徒终老乡里。其学博大通达，天文数学、经史艺文、音韵训诂、性理辞章、地理方志、医药博物，广为涉足，多所专精。一生所著甚富，卷帙之积，几近三百卷。其中，尤以《里堂学算记》、《易学三书》、《孟子正义》享盛名于学术界，一时有“通儒”之称。

焦循早年，得一方经学风气熏陶。乾隆四十四年（1779），与讲求经学的同窗顾凤毛结为友好，时年 17 岁。凤毛为著名经师顾九苞之子，承其家学，每有论说，多精核简要，极为焦循所叹服。两年后，焦循以治《毛诗》



开始了他的经学研究。乾隆五十二年（1787），顾凤毛将家藏《梅氏丛书》赠与焦循，勉励道：“君善苦思，可卒业于是也。”^①从此，焦循究心梅文鼎遗著，转而研讨数学。

在中国古代，数学为经学附庸，经师而兼治数学，历代皆然。入清以后，梅文鼎、王锡阐、薛凤祚等，就都有是以经师而精研数学的名家。到乾嘉学派崛起，江永、戴震、钱大昕等著名经学家，也同时以精于数学名世。戴震在《四库全书》馆所辑校《算经十书》，钱大昕所撰《三统术衍》及《廿二史考异》中于历代《历律志》的补阙正讹，皆是一时引人注目的佳作。焦循继承此一传统，在迄于嘉庆六年（1801）的十余年间，从钻研梅氏遗著入手，会通中西，撰写了一批富有成果的数学著作。后汇为《里堂学算记》刊行，成为此一时期数学成就的总结。

在致力于数学研究的同时，焦循还究心《三礼》，撰写《群经宫室图》上下31篇。他又将诠释《毛诗》旧稿六度改易，订为《毛诗鸟兽木虫鱼释》11卷。这两部著述同他的数学诸作一道，成为焦循步入乾嘉之际学术界的成名作品。如果说数学研究之所得，使焦循在人才如云的乾嘉学术界赢得了一席之地，那么他的《周易》研究，则使之卓然名家，一跃而跻身领先行列。

清代的《周易》研究，经过清初诸易学大师对宋儒易学的批判，迄于乾隆初叶，惠栋撰《易汉学》、《周易述》，考明古义，表彰汉易，已渐向复兴汉易一路走去。张惠言继起，专宗虞翻易说，推出《周易虞氏义》、《虞氏消息》诸书，孤家绝学，大明于世。水到渠成，一呼百应，究心汉易遂成一时易学主流。风气既成，“唯汉是求”声浪由易学推扩，迅速席卷整个经学研究 and 知识界。历史地看来，中国古代经学，由汉唐注疏演为宋明义理，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是历史的进步，而非倒退，理所当然应予肯定。宋儒治经，固有武断臆解之失，因而通过对传统经典的整理和总结，实事求是地还儒家典籍以本来面目，就是一桩很有必要的工作。但是唯古是信，唯汉是求，专以儒家经典疏解的还原为务，则未免失之矫枉过正。

有鉴于此，焦循对“唯汉是求而不求其是”的倾向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乾嘉之际弥漫于学术界的汉学之风，“述孔子而持汉人之言，唯汉是求而不求其中，于是拘于传注，往往扞格于经文。是所述汉儒也，非孔子也”。对于当时汉学诸家治经的蓄意贬抑宋儒，焦循提出了尖锐的质疑，指出：“唐宋以后之人，亦述孔子者也，持汉学者或屏之不使犯诸目，则唐宋人之

^① 焦廷琥：《先府君事略》，载《焦氏遗书》附录。

述孔子，岂无一足征者乎？学者或知其言之足征，而取之又必深讳其姓名，以其为唐宋以后之人，一若称其名，遂有碍乎其为汉学者也。噫，吾惑矣！”^①

焦循治经，一反盲目尊信汉儒的积弊，力倡独立思考，提出了“证之以实而运之于虚”的方法论。他说：“经学之道，亦因乎时。汉初，值秦废书，儒者各持其师之学。守之既久，必会而通，故郑氏注经，多违旧说。有明三百年，率以八股为业，汉儒旧说，束诸高阁。国初，经学萌芽，以渐而大备。近时数十年来，江南千余里中，虽幼学鄙儒，无不知有许、郑者，所患习为虚声，不能深造而有得。盖古学未兴，道在存其学；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学，后之弊患乎不思。证之以实而运之于虚，庶几学经之道也。”^② 何谓“证之以学而运之于虚”？用焦循的话来说，就是“博览众说，各得其意，而以我之精神气血临之”。这种精神，一言以蔽之，即学求是，贵在会通。焦循的易学研究，正是这种治经精神的集中反映。

治《易》为焦循家学，其曾祖源、祖镜、父葱，世代相守。其父且兼得岳家王氏说《易》之法，还在焦循 14 岁时，便给他提出了读《易》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为什么“密云不雨，自我西郊”的语句，既见于《小畜》，又见于《小过》。此后，他受这一问题启发，进而探讨“号啍”之再见于《同人》、《旅》；《蛊》、《巽》二卦的重复出现“先甲”、“后甲”、“先庚”、“后庚”；《明夷》、《涣》二卦同有“用拯马壮，吉”诸现象。然而历时近 30 年，四处请教，遍求说《易》之书，终百思而不得其解。嘉庆七年会试落第，决意专力治《易》。自十五年起，更摒除一切外务，潜心易学，终于在三年之后，陆续完成了他的《易学三书》，即《易通释》、《易图略》和《易章句》。当三年中的最后一部《易章句》于嘉庆二十年脱稿誊清，焦循时已年逾半百。

在易学园囿中，焦循辛勤耕耘数十年。始究程颐、朱熹，渐探服虔、郑玄，自汉魏以来，历唐宋元明，迄于当代惠栋、张惠言诸家，凡说《易》之书，皆摘其精要，记录于册。然后运用其先前数学研究之所得，“以数之比例，求《易》之比例”^③。同时，又将文字训诂学中的六书假借、转注诸法引入易学。终于摆落汉宋，自成一家。焦循说《易》，不赞成朱熹将《周易》

① 焦循：《雕菰楼集》卷七，《述难四》。

② 焦循：《雕菰楼集》卷十三，《与刘端临教谕书》。

③ 焦循：《易通释》卷首，《自序》。

视为卜筮之书的界定，将《易》定性为“圣人教人改过之书”。^①由此出发，他既否定了宋儒的先天易学，同时也不取汉儒的纳甲、卦气诸说，而是通贯经传，一意探求卦爻变化的“比例”。焦循将《周易》卦爻的推移法则总结为三条，即旁通、相错、时行。三者的核心，则在变通。他说：“能变通则可久，可久则无大过，不可久则至大过。所以不可久而至于大过，由于不能变通。变通者，改过之谓也。……舍此而言《易》，岂知《易》哉！”^②这样的变通，其归宿就在于通过《周易》的讲求，达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和谐境界。

焦循的易学研究，通贯经传固是其所长，而混淆经传也是其所短。他忽略了《周易》经传非一时一人所作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加以历史的局限，又过分尊信《周易》为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圣人”之作，因而他的治《易》三法，未免先入为主，多有牵强附会之失。但是会通汉宋，独抒心得，对学术真理的追求，其精神则是可贵的。焦循实事求是的治经精神，不仅体现于他的易学研究，而且也贯穿在群经补疏之中。诸如力排众议，肯定王弼《易》注的价值，认为《尚书》伪孔传可据以研究魏晋间经学等，皆不失为通达持平之论。焦循学求其是，贵在会通的经学思想，是对乾嘉汉学的一个批判性总结。它标志着汉学的鼎盛局面已经结束，以会通汉宋去开创新学风，正是历史的必然。（本文系由《周易文化研究》编辑部录自《清史学术拾零》的相关章节）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① 焦循：《易通释》卷一。

② 焦循：《易图略》卷三。

两晋易学之嬗变

王天彤

摘要：两晋易学是中国易学史上的重要一环，在此时期易学发展出现了叠彩纷呈的局面：一、王肃王弼易学勃兴于两晋时期，此为义理派易学的兴盛时期；二、汉代象数易学逐渐衰落，此为汉代易学的式微时期；三、易学开始向民间普及，形成了民间易学与官方易学并存的时期。这三者都对我国的易学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中国文化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周易》 义理派易学 郑氏易学 民间易学

公元二百八十年，西晋统一全国，这不仅仅是一种军事、经济和政权上的统一，更是一种文化的统一，学术的统一。有学者评论晋代易学曰：“郑氏没后，王肃之徒，始与为难；逞其邪说，多是臆造。若词有所窒，说有不通，或妄改经文，以见根据；或自为一书，以相左证；虽言繁而义达，实理疎而情漏。王弼注易，能作清言，异彼前儒，诡其新见。伪孔书传，亦兴此时，学者珍之如玉策，奉之如金科；郑学之衰，浸胎于此。”这段文字大体上说明了两晋易学的一个大概的状况。两晋易学发生了以下之嬗变：在西晋初期以王肃、王弼易学为代表的义理派易学勃兴，并迅速兴盛，成了当时易学研究的主流，在士大夫之间广泛流传，并且成为官方易学，此为义理派易学的兴盛时期；西晋中后期汉代象数易学进一步衰落，此时汉代今文学易学几乎成为绝学，而汉末崛起的郑玄易学此时之传人也微乎其微，此为汉代易学式微时期；两晋之交，是为易学普及时期，此时民间易学崛起，出现了许多民间易学家，这些民间易学与当时的士大夫易学团体的易学出现了交相辉映的局面，形成了民间易学与官方易学并存的时期。两晋是易学打破了象数易学的树篱，义理派易学形成并且获得了大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民间易学大发展时期，最终形成了士大夫易学与民间易学交相辉映的繁盛局面。

一 义理派易学的繁盛

两晋易学最显著的特色就是以魏王肃、王弼为代表的义理派易学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这首先表现在王肃易学成为西晋王朝的官学，而汉代的京、孟、梁丘等诸家今文学易学，则失去了官学的地位。在汉末魏初，名噪一时并形成“小一统”局面的郑玄易学，虽然依旧得到广大学者的重视，但始终没有被立为官学。王肃的经学理论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当时国家对于礼仪拟订皆“一如宣帝所用王肃议也”，“其礼则据王肃说也”。^①可见王肃易学在当时影响深远。王肃易学的特色是：对汉代今文学易学象数理论弃而不用，注重以传统上的儒家义理来阐释《周易》。王肃易学在西晋被列为官学，这表明新兴的义理派易学在西晋成为了国家的官方易学。

其次王弼易学也逐渐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同，如阮籍的《易通论》深受王弼易学的影响，当时的名士首领王衍对“何晏、王弼等……甚重之”，郭象被称之为“王弼之亚”，而陆云善于谈玄，被戏称之为王弼鬼魂所传授。王弼易学表现出强烈的儒道融合的特色，其“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思想源于《老子》，而“得意忘象”的阐释方法论源于《庄子》，以易治国的人本观念，则是对汉儒易学的继承。王弼易学的特色诚如余敦康曰：“（王弼）使这两部经典中所蕴含的本体论思想形成一种有无互补的关系，在贵无论玄学的理论基础上获得有机的统一。”^②王弼这种解易的方法为当时很多学者所学习，并且蔚为风气，如裴楷“尤精《老》、《易》”，王济“善《易》及《庄》、《老》”等，均是儒道合流以解易。到了东晋时期王弼易学发展到了其鼎盛期，标志就是王弼易学在东晋元帝时期就成为了官学，《晋书·荀崧传》：“时方修学校，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毛诗》郑氏、《周官礼记》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论语》《孝经》郑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仪礼》、《公羊》、《谷梁》及郑《易》皆省不置。”^③王弼易注因王弼的早逝而没有注完，在两晋时期很多学者都以补注王弼易注的《系辞传》为荣，根据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曰：“谢万、韩伯、袁悦之、恒玄、卞伯玉、荀柔之、徐爰、顾懽、明僧绍、刘

① 《晋书·礼志上》。

② 余敦康：《魏晋玄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145页。

③ “晋太兴四年，太常荀崧请置《周易》郑玄注博士，行乎前代，于时政由王、庾，皆俊神清识，能言玄远，舍辅嗣而用康成，岂其妄然。”（《南齐书·陆澄传》）

璲，自谢万以下，并注《系辞》。”共计十余位学者为之作补注，而吴承仕在《经典释文叙录疏证》曰：“自元嘉以来，王弼盛行，独阙《系辞》以下不注。故自谢讫刘，专注《系辞》，皆继辅嗣而作；其同以玄远为宗可知也。”也就是说这些学者的易学倾向，都是王弼易学的流裔。其中韩康伯的《系辞传》注释最为著名。韩康伯的注释深得王弼易注之精髓，为后世所称道“自韩氏专行，而各家并废”^①。在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中就使用了王弼和韩康伯两人的合著，这样才成为了《周易》一书的完注。张惠言在《易义别录》对王虞的易注评论曰：“东晋以后，言易者大率以王弼为本，而附之以玄言。其用郑、宋诸家，小有去取而已；非能通其说如王虞者是也。”^②此时王弼易学大盛于东晋，并影响到宋齐梁陈诸朝。

同时也由于王弼易学的兴起对传统易学形成了挑战。在士大夫之间产生了很多关于易理的争论，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就是东晋时期刘惔、殷浩、孙盛就“易象妙见于形”的问题展开的争论，此事见于《世说新语·文学》。

殷中军、孙安国、王、谢能言诸贤，悉在会稽王许。殷与孙共论易象妙于见形。孙语道合，意气干云。一坐咸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会稽王慨然叹曰：“使真长（刘惔）来，故应有以制彼。”既迎真长。孙意已不如。真长既至，先令孙自叙本理，孙粗说己语，亦觉殊不及向。刘便作二百许语，辞难简切，孙理遂屈。一坐同时拊掌而笑，称美良久。

其中殷浩、刘惔都受王弼易学的影响，都“俱好《老》、《易》”，而孙盛坚决反对以老庄玄学观点解易，认为王弼弃汉易象数、卦气诸说而专门笼络玄旨，有悖于《周易》之原理，主张唯汉易的传统才可以“穷神知化”，无违于大道。他主张从传统上的儒家道德出发来解读《周易》，这种易学主张是以传统上的儒家哲学为易道来阐释《周易》。

而关于殷浩、刘惔的认为《周易》的本质在于：

其论略曰：圣人知观器不足以达变，故表圆应于蓍龟。圆应不可为典要，故寄妙迹于六爻。六爻周流，唯化所适，故虽一画而吉凶并彰，微一则失之矣。拟器托象，而庆咎交著，系器则失之矣。故设八卦者，盖缘化之影迹也；天下者，寄见之一形也。圆影备未备之象，一形兼未

① 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第21页。

② 阮元：《皇清经解》卷一千二百四十六，上海书店影印本，1988。

形之形。故尽二仪之道，不与乾坤齐妙；风雨之变，不与巽坎同体矣。

纵观三人学术观点的不同点在于“象”与“道”之间的关系和地位。孙盛认为：卦“象”之中包含有易道，而“易道”必须通过“易象”来表达；而殷、刘认为虽然认为“易象”可以表达易道，但是易道的存在并非必须通过某一特定的易象来传达，也就是说易道是超越易象而独立存在的。三人辩论在本质上是道与器关系的论述。

这表明三人的争论的本质就是新兴的玄学易和传统的汉易之间的一次大辩论。这场争论一波三折，一开始是殷浩与孙盛辩论，虽然殷浩与在座的诸人，“一坐咸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此次辩论以孙盛为代表的汉易胜利，但是刘惔的出现又使孙盛自觉理屈。故而在此次辩论中，最终是以新兴的玄学易胜利而告终。从这段记述中可以得知王弼易学得到了大多数士大夫的认同。

总之，整个两晋时代以王肃、王弼为代表的义理派易学迅速发展且先后被立为官学，成为了当时的主流的易学思潮，可谓风行一时。

二 汉代易学的衰微

相对于义理派易学的兴盛，两晋时期汉代易学思潮在王肃、王弼易学的冲击之下逐渐衰微，甚至到了几乎亡佚的窘境。汉代的今文学派易学主要分为两大学派，一是以梁丘、施氏、高氏为代表的汉代今文学易学，二是汉末兴起的以融汇古今文学易学为主要特色的郑玄易学。其中汉代的今文学派易学几乎成为绝学。根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汉代今文学易学中的“梁丘、施氏、高氏，亡于西晋。孟氏、京氏，有书无师。”认为曾经被两汉立为官学的今文派易学中的梁丘、施氏、高氏易学在西晋时期已经亡佚，而孟氏易学、京氏易学在西晋时期虽然易注依旧存在，但是研习孟京易学的经师已经没有了。由此可知汉代今文学在两晋时期已经成为了绝学。但是事实也并非如此，也有一些学者坚持研习汉代的今文学易学。这种研习主要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以干宝、郭璞为代表的，虽然没有直接研习汉代今文学易学，但是在自己的易学著述中灵活多变的使用汉代今文学易学理论，如干宝在《周易干氏注》中就多次引用汉代的今文学易学的理论来解易，是汉代今文学易学以一种新的形式获得新生；同时另外一种就是严格按照汉代易学的家法和师法研习汉代今文学易学。如董景道“明《春秋三传》、《京氏易》、《马氏尚书》、

《韩诗》，皆精究大义”，郭琦“注《谷梁》、《京氏易》百卷”，这些学者虽然也在研习汉代今文学易学，但是从总体上看汉代今文学易学的研习者非常的稀少了。

汉代的今文学易学在此时期，还以一种新形式出现，即以一种占蓍的方式出现在社会中。利用汉代易学理论进行占蓍，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进行预测，运用十分的广泛。有的用来预测国运的兴衰，有的则用来预测家族的命运，有的预测个人的吉凶祸福。比如著名的易学大师郭璞、干宝等，就多次使用了汉代象数理论，进行了占蓍，以预测将来的吉凶。郭璞易注“抄京、费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韵》一篇”^①都是讲述占蓍之学的。在很多文献中都记载了郭璞的占蓍，如其为宣城太守殷佑所作的占蓍就是使用了郑玄的爻辰理论，而为晋元帝的占蓍则使用了汉代象数易学中的“卦变理论”。在郭璞很多的占蓍实例中，往往是为了维护国家政权的权威，或为了国家政权的稳定。郭璞为晋元帝的占蓍：“始，元帝以丁丑岁称晋王，置宗庙，使郭璞筮之，云‘享二百年。’”从结果上看，郭璞的占蓍确切地说不准确的，但是考虑到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东晋政权刚刚建立，还没有得到普遍的承认，郭璞作出了“享二百年”的判词，这对于始建伊始的司马睿政权以巨大的鼓励，也体现了郭璞个人希望有一稳定长久的国家政权。王虞称赞郭璞曰：“晋陵有金铉之瑞，郭璞云必致中兴。璞之爻筮，虽京房、管辂不过也。明天之历数在陛下矣。”^②郭璞易学乃是汉代京焦易学在此时期的一种表现。而干宝著有《周易注》、《周易宗涂》、《周易交义》、《周易问难》、《周易玄品》等，皆已佚失。就其仅有的《周易注》部分佚文（见李鼎祚《周易集解》）看，他继承京房以来的汉易传统，对于汉易象数学的卦气、纳甲、互体、五行、八宫诸说都有所吸取。但是从总体上看，两晋时期汉代今文学易学处于式微的阶段，甚至成为了绝学。

郑玄易学在两晋时期，经历了由兴盛到迅速中衰到再度复兴的曲折发展过程。在魏明帝时期“天子于是下诏，但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余家”^③这正是郑玄易学小一统的时代。西晋时期，郑玄易学迅速的衰落，这一方面是王肃易学的产生，这对郑氏学有了很大的冲击。诚如皮锡瑞曰：“郑氏学出而汉学衰；王肃出而郑氏学亦衰”^④，这表现为研习郑氏易学者日希，《晋书》

① 《晋书·郭璞传》。

② 《中兴赋》。

③ 《晋书·刑法志》。

④ 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105页。

中明确记载研习郑氏易的学者，只有续咸一人；另外一方是由于统治者偏好的转移，也导致了郑玄易学的衰落，西晋时期用王肃易学为官学，而王肃易学以攻击郑玄易学为己任，故也导致郑玄易学衰微。《晋书》记载曰：“文帝为晋王，患前代律令本注烦杂，陈群、刘邵虽经改革，而科网本密，又叔孙、郭、马、杜诸儒章句，但取郑氏，又为偏党，未可承用”。西晋时期正式立王肃易学为官学，这标志着郑玄经学“小一统”局面衰落了。虽然专门学习郑玄易学的学者少了，但是郑玄易学对当时易学家的影响还是很深的，这从当时的易学著作中可以看出，在当时的所有易注中，无论是义理派易学的王廙、黄颖、张璠等，还是象数易学的干宝，甚至是以攻击郑玄易学为己任的王肃易学，或从训诂角度，或从易学理论的角度对郑氏易学都有所汲取和继承。这也为郑玄易学在东晋的再度复兴奠定了基础。

东晋元帝时期设立官学，“方修学校，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毛诗》郑氏、《周官礼记》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论语》《孝经》郑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仪礼》、《公羊》、《谷梁》及郑《易》皆省不置”。学者荀崧认为这样不利于儒学的发展，主张增设四家博士“宜为郑《易》置博士一人，郑《仪礼》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谷梁》博士一人。”^①也就是说荀崧强烈建议把郑氏易学列为官学。虽然由于政局的动荡荀崧的建议没有实施，但是，这为郑氏易学在南朝列为官学奠定了基础，也为郑玄易学在后世的复兴奠定了基础。^②

三 官方易学和民间易学的并立

此时的易学还有另一个特色就是官学和私学的并立。在两晋时期设立的官学，“晋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及咸宁四年，武帝初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义者，若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试。及江左初，减为九人。元帝末，增《仪礼》、《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为十一人。后又增为十六人，不复分掌《五经》，而谓之太学博士也。孝武太元十年，损国子助教员为十人”。通过这段记载我们可以发现，官学一直处于衰退的过

① 《晋书·荀崧传》。

② 《隋书·经籍志》曰：“梁、陈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齐代唯传郑义。”

程。这从所设的博士数量上可以看出，由晋初的十九人，在武帝咸宁四年（278）减至十七人，在东晋元帝时期减为九人，后虽间增至十六人，但最终定为十人。晋代的官学一直处于衰落的过程，这是由于晋代官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远不能和汉代官学相比。经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有所下降。其次汉代的“官学”是普通士子入仕的一个重要途径，而在两晋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来选拔人才，所以普通的士子通过“官学”而入仕发达的道路也行不通了，进入太学成为太学生对于普通的士子也没有太多的吸引力。而且进入太学的学生也往往“不修经艺而务交游，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禄；农工之业多废，或逐淫利而离其事；徒系名于太学，然不闻先王之风。”^① 所以此时期官学在社会中的影响地位日益减退。故王肃易学虽然被列为官学，但是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却远远不及没有被列为官学的郑玄易学、王弼易学以及民间易学影响大。

相对于官学的衰落，民间的易学却繁盛起来。这些学者大多是京焦易学、郑玄易学传人，其传承《周易》方法，就是利用汉代今文学中象数理论来占蓍预测吉凶。如李修、卜显就是把象数易学和天文结合起来以预测吉凶，《晋书·律历下》“咸宁中，善算者李修、卜显，依论体为术，名《乾度历》，表上朝廷。其术合日行四分数而微增月行，用三百岁改宪之意，二元相推，七十余岁，承以强弱，强弱之差盖少，而适足以远通盈缩”，其他见于《晋书》的以占蓍著称的学者还有：淳于智“能《易》筮，善厌胜之术”；步熊“少好卜筮数术”；严卿“善卜筮”；陶淡“颇好读《易》善卜筮”；韩友，“受《易》于会稽伍振，善占卜，能图宅相冢，亦行京费厌胜之术”；戴洋“好道术，妙解占侯卜数”；步熊，“少好卜筮数术，门徒甚盛。”这些学者之所以被称为民间易学，首先是指这些学者大多没有官职，更没有像京房一样能够得到皇帝的支持，进入了国家权力的中心。郭璞虽然有一定的官职，但是也不是很大，更没有真正得到晋元帝的信任而进入国家权力的中心。其次这些学者的学术从来没有取得官学的地位，影响较小，仅限于师徒之间。最后这些学者服务的对象主要是中下层的民众。虽然也偶有象李修、卜显、郭璞等人那样直接为君主服务的，但是就大多数人而言，服务的对象还是中下层的民众，如韩友“能图宅相冢，亦行京费厌胜之术”，而郭璞也曾经为人相冢。然而这种民间易学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却都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同时由于魏晋时期官学的衰落，很多知名的学者流落于民间。他们纷纷

^① 《晋书·傅玄传》。